

高校评估质量：知识、权力与主体

刘 晓¹ 叶安胜²

(1.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2. 成都大学教务处,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引擎。“知识—权力—主体”是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高校质量评估场域是由“知识”“权力”“主体”构成的立体空间。主体背后是权力/知识的运作，高校“局内人”也会带着不同的质量意识进入评估场域，进而带来教学质量变化。因存在着参照标准的模糊性、技术治理的强制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评估场域呈现出不同的权力反制表征。由此，依循权力社会学观点，我们须深刻把握三组张力：规制有限性与能动无限性之间的张力，标准有限性与权威无限性之间的张力，认知有限性与意义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高校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知识；权力；主体

一、前言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引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障和提高质量成为国际范围内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议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外部开展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以政府为主导，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HEEC）设计了“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并负责实施和落实；内部质量保障活动则以高校为主体的所有程序、环节及内容。不过，从实践层面来看，高等教育质量因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推动获得了何种改进依然未有明确的答案。从既有文献研究来看，已有相关学者基于权力视角，探究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的权力运行机制等问题。不过，从基于福柯“知识—权力—主体”三角关系的视角，来深入研究高校质量评估和评估质量的关系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基于四川省F大学审核评估和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案例实践，围绕“知识—权力—主体”三大核心要素，试图对高校质量评估场域中易被遮蔽的“知识—质量”“权力—质量”“主体—质量”三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进而为提升高校评估质量提供参考意义。

二、高校质量评估中的知识、权力与主体

（一）知识与评估质量

在福柯的语境里，知识脱去了“真理”的外衣，被还原为话语实践的产物。这里的话语实践是将话语和非话语领域（制度、事件、进程等）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是权力和知识共生关系作用下的过程和结果。一定意义上，“质量标准”是评估场域内话语实践的产物。由此，我们聚焦关注评估标准的生成与再生产过程。高校评估质量是教育教学组织与实施过程符合“质量标准”的程度。

一是依循评估质量标准，持续赋能与放权。虽然评估标准一直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评估标准之所以能够被标榜为“标准”，正是因为它能够在—个阶段中让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足够确定与持久，正如帕森斯笔下的“共享价值”。尽管在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的包围下，高校评估场域内的主体貌似已“无处可逃”，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主体在不确定的建构过程中自我完善。

二是依循评估检查标准，再生产专业与价值。尽管微观场域内的各类检查在特定时期内，被更多赋予了仪式化的意义。但这种仪式化的过程，不仅充斥着规训意义，也弥散着生产和再生产

意义。聚焦评估来看，教师群体的“再备课”过程，体现了其专业性价值的再生产。同时，学生群体在充满默契度的仪式性互动中对所学知识的“再感受”，也是一种知识再生产的体现。

微观权力观下，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容”的，两者在悄然之间还会以“同盟”关系存在。高校评估场域内，在一整套质量标准的制定、参照、执行和建构的程序中，知识得以生产并支持着制度产生权力效应，也会触发无中心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质量意识，进一步反制既有权力的支配效应。在此过程中，知识、权力与主体三者之间相互生成、相互作用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说，知识是权力的载体，权力是知识的来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就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基于微观权力观下对高校评估中知识、权力与主体关系的分析，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权力与评估质量

权力是具有意向性的作用力。高校“局内人”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以重塑“责任共同体”关系作用。高校“局内人”将多种微观权力结成共同运作的锁链体系，并被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规范性准则，规训着。一定意义上，高校评估质量是高校权力机制运行的效果。评估作为一种工具，本身是一种权力资源。评估质量的提高，不只是高校与政府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更多是两种权力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形成与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高校组织内部的自我认知与理解，也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深度介入。

一是组织中的角色趋于在书面协议中不断正式化。当角色的分化和安置以高度制度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目标达成的功能性就会更容易被凸显出来。高校评估场域内层级责任制的实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高校质量评估中的外在一致性与内在一致性。这里的外在一致性是指高校内部的组织架构，能够与外部质量评估的指标点，保持一一对应或多对一的关系。而内在一致性是指专业发展需求和参与者专业素养、能力水平的一致。

二是制度化奖惩通过温和手段使权力关系裹挟。制度化奖惩虽不具有规范发文的刚性约束力，但确实将权力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动机转变为一种缄默知识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由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生发出来的符号暴力，虽然具有强烈的约束性和压制性，但却无法实现规训的长效意义。当这种含情脉脉的道德关系与权力关系“裹挟”在一起后，质量文化的潜移默化等，

都将呈现出“水到渠成”的态势。

正式化角色和制度化奖惩等手段的使用,体现了其正向功能。但一定要注意其中隐含着的技术手段对专业性的压制与规训,以及督导专家“符号”象征作用及专业权威对技术化治理手段实施过程的反制。在技术化治理的过程中,权力主体可以依循“循规与顺从”的惯习而服从大局的安排。但当个体自我认知觉醒,综合更多利益考量而不再一味地屈从于既定的技术治理程序时,评估中微观权力反制现象就愈发凸显。比如,一些高校的评估专家会通过直接与评估对象对话的方式,就评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沟通交流,这些沟通交流被称为“诊断式评估”(Diagnosis-Examination)。诊断式评估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教学评估,一方面,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被评估对象学习成效进行诊断和评价;另一方面,其在目的上是对高校教学质量进行诊断和评价,重点在于通过诊断与评价来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然而,由于受技术手段的制约,以及受专家权威影响等原因,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很难完全满足高校教师的诉求,特别是当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

(三) 主体与评估质量

福柯认为,“主体不只是由权力所构成的,他们自己也通过自我实践而参与了这一建构,并改变自己”。主体不仅是驯服的身体,而且可以积极拒绝、采纳和改变成为某种主体的方式。对于个体而言,“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内在的自觉指向即为需求的哲学意义,人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征,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表现为一种需要”。一定意义上,高校评估质量是权力多主体需求被满足的程度。

一是满足主体内生型需求,构建需求导向式的评估体系。“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各项改革和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导向功能。具体来看,“以学生为中心”作为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学生发展”这一个指标项上,也体现在其他七个指标项中。整体来说,“适应个体需求”成为衡量普及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

二是满足主体外延型需求,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改进。高校评估场域内,为使个人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不同的权力主体间会结成“同盟”,联合起来以获得更多的需求满足。人的需求就像是天性和欲望一样,是具有无限性的。不过,“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客观对象的有限性是一对矛盾,也是构成社会的动因和社会发展的根源。”高校“局内人”为避免造成利益驱动下无谓的争夺,会选择性把握“度”,在有限理性中实现统一和平衡。

高校质量评估场域内,无论何种类型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权力主体的能动性都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增强。不过,在不同权力主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碰撞交融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需求也会为权力运行的实现带来障碍,形成更为复杂的微观权力关系网络。

三、微观权力视角下的高校评估质量审思

(一) 需深刻把握技术治理的规制有限性与能动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在传统的权力观视域下,“权力运作是立足于剥夺对方的权力与既得利益之上,因而一方所得,乃是建立在另外一方所失之上”。虽然微观权力视域下的非零和博弈或者正和博弈,强调的

是“共赢、共享、共同增长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宰制了关系”。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权力零和博弈在高校质量评估场域内,依然时有发生。它导致技术治理模式下的技术治理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宰制和压制了专业性权威的施展,从而使权力机制运行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这必将会带来权力间的冲突和秩序的破坏,也会对权力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质量意识,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零和博弈思维下的权力运行,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质量评价和教学组织管理中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 需深刻把握微观权力的标准有限性与权威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质量标准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高校“局内人”在观念上,会慢慢接受那些被选出的代表教育质量的可测指标,而“忽视与可测量价值无直接相关的社会性的、情感性的、道德性的发展活动”。我们认为,质量标准不是一个永不改变的恒定值。在这种从不相信到相信的变化系列过程中,个人可能最初更多是受到外在力量的规训,后来却可能内化为个人新的信念和价值,为了得到尊重而主动地被规训。我们应认识到,在新时代的质量评估改革和高质量教育发展中,质量标准需要与时俱进,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与价值意义。由此所形成的更为复杂多样的微观权力秩序和权威性,必将对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带来更多的挑战与可能性。

(三) 需深刻把握权力场域的认知有限性与意义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不同类型、层次的需求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共存于复杂的群体互动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阶段内,每一个权力主体需求的无限性和所能提供需求满足能力的有限性都是彼此关联的。我们应深刻把握他们这种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张力,为权力主体的能动发挥提供条件与空间,才能最终实现权力格局的多维建构和教学过程的良性运作。新媒体时代专家符号化、象征性权力的限度、技术化治理手段的力度,以及教师知识权威的适度,学生参与性需求的多样性等,皆是需要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管理与实施,以及教育教学活动中加以重视的。

参考文献:

- [1] [芬]约翰·奥克萨拉.如何阅读福柯[M].王佳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146.
- [2] 刘晓,张烨.论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实施中的权力运行——基于抗疫背景下在线教学活动案例的分析[J].教育学报,2022(2):5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一般课题“新时代高校审核评估的分类评价困境与优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CJF2200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晓(1988—),女,四川德阳人,教育学博士,成都大学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教育社会学。

叶安胜(1971—),男,四川仁寿人,成都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